

桂苑书林丛书

三管诗话校注

〔清〕梁章钜 著

蒋凡 校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苑书林丛书

《三管诗话》校注

(清)梁章钜 著
蒋 凡 校注
梁超然 审订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特约编辑 梁燕鸣

责任编辑 欧薇薇

0340070

《三管诗话》校注

(清)梁章钜 著

蒋 凡 校注

梁超然 审订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850毫米×1168毫米1/32

10.125印张252千字

广西桂苑国际科技

服务公司印刷厂印刷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ISBN 7-219-02319-7/I·633

定价: 20.00 元

桂苑书林丛书出版说明

根据党中央有关整理古籍的指示精神，我社深感对有关广西的古籍或资料，加以整理出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决定出版桂苑书林丛书，把有关广西的诗、文、史、地、科技、社会、民族、人物的古籍或资料，分别整理，或校点、或校注、或校补、或选注、或辑录，陆续出版，借以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供读者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对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当有所裨益。

创业之初，承莫乃群同志担任主编，并邀请广西通志馆、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古籍整理研究所、广西大学中文系古籍整理室、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与我社组成编辑委员会，大力支持我社出版这套丛书。莫公逝世后，承蒙韦纯束、骆明等同志担任顾问，钟家佐同志继任主编，组成新的编委会，继续主持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经济上，完全得到广西桂苑国际科技服务公司的供给。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本丛书创办初期曾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数种。由于工作关系，自1987年8月起改由我社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5月

0110071

桂苑书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韦纯束 骆 明

主 编 钟家佐

副 主 编 黄振中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吕孟禧 李瓚绪 林仲湘 唐志敬

唐崇锦 黄振中 黄盛陆 梁超然

张葆全 陈仁华 陈光坚 孙权科

欧薇薇 钟家佐

编辑工作人员

梁燕鸣 莫雁诗 陈自力 赵大冠

秦邕江 吴中任

序

梁超然

1982年秋，莫公乃群约我至国际旅行社一号楼寓所，商谈整理广西古籍及筹建《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事宜。谈及选目，我曾提到梁章钜的《三管英灵集》及《三管诗话》。莫公以为：梁氏此著极有益于研究广西诗歌，他是福建人，为广西地方文献的整理出了很大力气。1983年夏，《桂苑书林》编委会成立，拟订初步选目时，《三管英灵集》、《三管诗话》均在选目中。莫公交待，《三管诗话》一著由我负责。因《书林》初立，诸事繁杂，编委会主要精力投入《〈粤西诗载〉校注》、《王鹏运词选注》、《袁崇焕资料辑录》、《桂海虞衡志校补》等书组稿编审工作，未暇顾及其他。1985年春，受聘于西北大学，西入长安，带几名研究生，并忙于中华书局《唐才子传校笺》七、八两卷笺证工作，《三管诗话》亦搁置下来，然心未尝不耿耿也。及后，莫公为拙著《八桂诗人论及其他》作序时，在序言中又一次提出梁章钜对整理广西地方文献的功劳，我便急于想完成《三管诗话》校注之任务。

1985年10月，福建邵武召开全国严羽学术讨论会，会上与友人蒋凡先生重逢。当漫步建溪畔，探胜武夷山时，交谈中得知蒋凡先生正为福建人民出版社整理《梁章钜全集》。梁章钜著述丰富，整理其全集工程可谓浩大，但蒋凡先生学殖深厚，治学谨严而勤奋，整理《梁章钜全集》可谓举重若轻。正由于此，忽萌一念：仰仗蒋凡先生大力，为《三管诗话》作校注。当即向蒋凡先

生提出，请他担负此项工作。难得蒋凡先生慨然允诺，使我至为高兴，将此事驰书向莫公汇报。莫公回函云：“梁章钜《三管诗话》编入《书林》（指《桂苑书林》丛书）极为必要。你的意见甚好，请即与蒋凡副教授联系，请他承担校注任务。”蒋凡先生努力经年，终于完成了《三管诗话校注》一稿。

《三管诗话》系清人梁章钜所撰集。“三管”指唐代桂管、容管、邕管，三管经略使辖地约略相当于今广西全境，前人以此代称广西。梁章钜，清代中叶大学者、大学问家，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五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调任江苏巡抚，离开广西。梁章钜在学术上继承乾嘉学派作风，又受到时代风云的影响，特别是与林则徐、魏源等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相互交往，相互浸润，在梁章钜身上注入新的思想因素。他热心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在广西五年，广泛搜集资料，编成《三管英灵集》五十七卷，并同时编撰《三管诗话》上、中、下三卷，先期付刻行世。《三管英灵集》及《三管诗话》，都是研究广西文史极其重要的典籍。《三管英灵集》收集古代至道光前之历代广西诗人创作及有关广西之诗歌作品。由于梁章钜从各种诗文集、地方志中广为搜罗，所收诗歌颇称完备，如袁崇焕之诗作，赖《三管英灵集》得以传世。《三管诗话》则是编集《三管英灵集》之同时，从各种史书、笔记、诗话、随笔著作中辑录广西诗人及有关广西诗歌之资料加上梁氏之评论而成。由于梁章钜学识渊博，见解深刻，所以，《三管诗话》极具史料参考价值，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研究广西史文所必备之典籍。正由于此，莫公多次提及整理此书供今人研究参考之必要性。

蒋凡先生此次校注，除功力深厚之外还以严谨慎密之学术态度对待，不以其为地方性诗话而忽忽，此点尤值得钦佩也。蒋凡先生此著，整体而言，从校、考、注、补四个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以校而言，蒋凡先生选取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刻本为

底本，既校以《三管英灵集》中所缀附之《退庵诗话》，又校以《三管诗话》称引之书，并汲取今人研究成果，使原《诗话》中一些沿袭旧著之错误者得以校正。如五代时诗人翁宏，《全唐诗》小传等书均作桂林人，而明人胡应麟《诗薮》等则云：寓居韶、贺间。其实均误。翁宏应是桂岭（今属贺县）人，寓居韶、贺间。蒋凡先生根据今人考证成果及一些材料，校改为桂岭人，寓居韶、贺间。此类校正，是蒋凡先生经过多方考证之后，慎重斟酌才决定取舍，表现谨严的学风。蒋凡先生学殖深厚，长于考证。在本书的校注中，蒋凡先生对一些可考的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如《三管诗话》引《全唐诗》“无名氏”诗句中所辑《桂林诗评》诗句。蒋凡先生在注释中，对《桂林诗评》一书作了考证，以为与唐人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有关，颇有道理。又如关于“湘南属粤西”之说，蒋凡先生经考证，肯定了梁章钜在《诗话》的记述，颇见考证工夫。蒋先生在本书注释中，不仅一般注释字词，疏通字义，名物训诂（当然，这些方面，本书内容是极丰富的，值得称赞），而且尤其注意训释与广西诗歌发展有关的人事物，对研究广西文史者至为方便。蒋凡先生在注释此书时，尽可能补充《三管诗话》中所没有辑录之资料，亦对广西文史研究者大有裨益。如曹唐、赵观文、冯京、欧阳辟等等条目的注释中，均补充了不少古书中的资料，或录自诗话，或录自笔记、或录自方志，均极有参考价值。如曹唐条，补充元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明人谢榛《四溟诗话》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赵观文条，补入黄滔《唐昭宗实录》原文，使读者能较深地了解赵观文参加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进士科考试情况。欧阳辟条则据《困学记闻》、《宋诗纪事》、《独醒杂志》等补充颇多。诸如此种补充，本书所在多有。由于蒋凡先生涉猎广博，故补充之资料，常有发人所未见者，给读者贡献了颇丰富的资料。

总而言之，蒋凡先生此次校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资料丰

瞻、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三管诗话》校注本。可惜岁月匆匆，天不假人以寿，莫公乃群已作古，不及见此著问世矣，思之怆然！但经历一段曲折历程之后，莫公开创的整理广西古籍之事业，今又能继续下去了，此可告慰于莫公在天之灵也。

蒋凡先生虚怀若谷，来函命余作序，而《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又分工由我阅读此著，故尔亦理应将此著前后经过向读者交待，并简述阅后感想。今一并写如上，聊以为序。

1992年仲秋于

相思湖畔三书斋

前 言

一

当清代中叶“乾嘉盛世”的沉重帷幕在历史舞台上最终落下之际，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神州大地的时刻，梁章钜正在广西巡抚任上。他主政广西五年，清廉自洁，官声甚佳，又热心于广西的地方文化事业，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为可贵的是，他在广西巡抚任上，政暇谈艺，即着手编撰《三管英灵集》五十七卷和《三管诗话》上、中、下三卷。《三管英灵集》的“三管”，原指唐代岭南五管中的广西三管，即桂管、邕管和容管，所辖境土相当于今广西省，故古人常以“三管”雅称广西。《三管英灵集》是一部古代广西诗歌总集，辑录广西通省古近人遗诗。同类性质的总集，明以前不见编选。入清以后，有汪森《粤西诗载》和张鹏展《峽西诗钞》。前者收录古代至明末有关广西的诗词作品，但不录清人之作，于古又有挂漏。后者所录，上起明之蒋冕，下迄嘉庆，则又忽略古作。于是梁章钜在充分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针对上述二书的缺陷而加以弥补，又广泛参考各种方志（按：如当时新撰谢启昆本《广西通志》及各种府、县志），搜罗近现代诗人诗集，注意辑佚挖掘工作，既精选古作，以反映历朝广西诗歌发展概貌；同时又重视近现代的作家作品，广加搜辑，略加评论，表现了“不薄今人爱古人”（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公正态度。网罗繁富，体例详备，兼有《粤西诗载》与《峽西诗钞》之长，与之鼎足而三，成为研究广西诗歌发展及文化历史的重要参考著作。

梁章钜（1775—1849年），其族系出于安定梁氏。字闾中，又字茝林（或作“芷林”），晚年自号退庵。原籍福建长乐县，居南乡江田里。清初，迁居福州，故又为福州人。自明至清中叶二百余年，梁氏世以读书业，纪昀督学福建时，曾以“书香世业”四字旌匾其家。故自章钜父辈以前，虽乏达宦，但其家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于章钜本身，自有良好的家风传统影响。其父梁赞图，字斯志，又字翼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举人，考补内廷咸安宫教习，调选汀州府宁化县学教谕，实际是一个颇有学识的教师。少年梁章钜即随侍父亲读书，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为以后的著述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成举人，嘉庆七年（1802年）登进士第，时年二十八。以翰林院庶吉士用教习，散馆授礼部主事。入仕前，曾辑《东南峤外书画录》；登仕后，公务之暇，照样勤于著述，表现了学者的本色。不久因病家居，掌浦城南浦书院讲席。后考选军机章京，入直军机，加入宣南诗社，任礼部员外郎，外任湖北荆州知府，江南淮海河务兵备道，管理盘运漕粮总局，江苏、江西按察使，山东、江苏布政使，四次护理江苏巡抚九年有余，授甘肃布政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升任广西巡抚，二十一年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裕谦兵败自杀后，署理两江总督。在广西巡抚任上，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曾率兵至梧州防区堵截英侵略军。调任江苏巡抚时，甫离广西，即直趋上海前线，与提督陈化成同心协力，练兵练炮，搜捕巨奸，刁斗森然，严陈以待。后以头痛旧疾复发，数次晕倒职位，遂引疾归田。但仍关心国家大事，力主抵抗侵略，其《归田琐记》卷一《堵江口》曰：“余侨寓邗上，……闻海上警报，怒然忧之。”他曾对地方官建议：“夷情

如此猖獗，难保其不犯长江，则瓜洲一带口门，不可不预为之计。”预先提出动用地方财政，募民兵奋起抗战，在长江一带布防埋伏，以废船堵江口，在船上伏枪炮，层层扼隘，重重阻击，“英夷虽猛，恐亦不能飞来矣”。可惜未被采纳施行。又因战乱，东西萍寄，“不但无田可归，竟至有家而不能家”（见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一《归田》）。后其三子恭辰任浙江温州知府，遂卒于温州，时年七十五。

梁章钜历任地方官。一般刮地皮的贪官是“一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梁章钜则基本保持清廉的书生本色，熟知民间疾苦，颇富同情之心，读其《河上杂诗》《监利喻民》《苦雨》诸诗可知（见《退庵诗存》）。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却常自掏腰包为地方修建古迹（如广西五咏堂），积极救济灾民。林则徐在道光十二年作《题梁芷林方伯〈目送归鸿图〉》诗，称颂曰：“惻悻救时心，卓荦经世务。不辞一身瘁，残黎活无数。岂无危言阻？勇者能不惧。”（见《林则徐诗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据《退庵自订年谱》，林则徐所述当为道光十一年事，时梁章钜护理江苏巡抚：“辛卯，五十七岁。江淮大水成灾，流民蔽江而来，每日以万计。乃率属捐廉（按：廉，指官吏的养廉金，相当于后代的附加工资之类），出示募捐，一面给船咨送，一面设厂留养。计自秋初至孟冬三月余日，资送出境者六十余万人，自初冬至次年春季在厂留养者四万余人，复自捐棉衣万袭，以为厂中御寒之具，于三月末陆续资送北返，沿途颇有颂声。何竹蓐郡丞为作《目送归鸿》画卷，高雨农舍人澍然为之记。”（见《退庵自订年谱》）林则徐之称誉，言之有据，并非诗人溢美之辞。

梁章钜的性格，沉静稳重，寡言少语。但与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一样，都具有一颗火热的心。他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知名人物，交谊颇深，思想共鸣。他和龚自珍，相交数十年，情谊非一

般。其《师友集》云：“仁和龚定庵主事，……抱负恢奇，才笔横恣不为家学所囿。初入京师，即与程春庐及余订交。……，丙申，余由甘藩入觐，君约程春海侍郎、徐星伯、吴虹生二中书，饮于虹生寓斋，为文以饯之（按：即龚自珍《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三篇），……余尝刻入《宣南赠言》中，而读者嫌其语多触忌，此井蛙之见耳。君之归也，掌丹阳讲席。适余在上海防堵，邮书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余方扫榻以待，数日而凶问遽至，为之泫然。”龚自珍力主改革，“语多触忌”，但梁氏不以为嫌。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二人书信往返，讨论时局，共商对策，龚氏并应邀入梁氏江苏巡抚幕府，同仇敌忾，共同抗敌，以图复兴。其思想之共鸣，于此可见一斑，惜龚氏天年不永，溘然遽逝，遂致梁氏泫然之叹，悲乎！又梁氏与魏源，也颇有交谊。如其《毗陵舟中有怀书上诸君子，人系以诗，皆一年中往来至熟者》组诗中有《魏默深州牧》诗云：“默深名进士，而甘牧令卑。不默复不深，外宦岂所宜？比年富著作，时流多惊疑。此才合台省，优为国羽仪。”默深，魏源字，官至江苏高邮知州，故称州牧。梁氏又于“时流多惊疑”句下自注云：“默深著书甚富，近复成《圣武记》及《海国图志》，尤为创辟。”魏源的启蒙思想与改革主张，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中有集中的反映。梁氏誉之为“创辟”之著，推魏源为国家“羽仪”，可见其思想共鸣。至于林则徐，则为故乡知己，感情尤深，生死不渝，二人往返交游之迹，可于二家著述中见之。梁氏以嘉庆十三年（1808年）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后二年荐林则徐以自代。《退庵诗存》卷十七有《录别五百字送林少穆服阙入都》诗。鸦片战争后，林则徐作为抗战派领袖被贬斥流放，但章钜却颂之为“远迹所同钦”，云：“以逐臣而犹为民为国，岂复是寻常报称之情！”（见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二《少穆尚书赠联》）他在梦中，都在盼望林则徐遇赦生还，其《半东园日记

诗》自注云：“昨有传林少穆已赐环（还）入关者，为之喜而不寐，实谣言也。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与少穆为比邻者数年。”而《林则徐诗集》中赠梁之作也不少。梁氏五十诞辰，林则徐亲自作画题诗以贺，诗题是《梁芷林观察章钜五十初度，写〈报国图〉寄祝，并系以诗》：“玉馆昭华已奏功，鹤飞一曲趁清风。仙心合拟淮南子，寿骨遥推河上公。秋是八千还遇闰，诗成五十未称翁。看君直节长承露，验取高岗百尺桐。”此诗是道光四年（1824年）作于苏州，时林则徐署江苏布政使。则徐所画，当为梧桐图以贺寿。其擅绘事，于此可见，惜今放佚不传。梁章钜去世，林则徐为作《墓誌铭》以寄哀。梁林二人，思想品格及为人大节，必有本质一致之处，才能友谊长盛而不少衰。比较而言，梁章钜受传统文化熏陶较深，政治上不如林则徐激进，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却与林则徐一样经受了时代战火的洗礼，凛然正气，直贯斗牛，激动人心。因此，他的思想和著作，虽然存留了一些传统的印记，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总体倾向并非保守，而时有改革火花的闪亮。在学术上，梁氏著述勤勉，作品宏富，世所罕见，著作等身，并非虚誉。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其中不免有某些集体著作或幕僚代笔捉刀，但重要著作，相信多为亲笔，他人多是据其立意布局，查找资料，尽抄辑之功。据随侍广西幕府的章惇《归田琐记跋》云：“如《楹联丛话》、《三管诗话》、《铜鼓联吟》诸刻，皆成于簿书丛杂之余。即至梧江防堵，戎马倥偬，羽檄飞驰，中夜数起，而尚能抽暇创成《三国志旁证》一书。其忙中整暇如此，况今日之优游田里，闭户著书，俗缘不干，真想自适者乎？”其著作，据其《归田琐记》卷六《已刻未刻书目》，已有四十一种之多。当时作者年近七十，后来又在这五、六年里，增添了许多作品。据林则徐撰《墓誌铭》，其著作有六十七种，今附目于下：

《论语集注旁证》二十卷，《孟子集注旁证》十四卷，《夏

小正经传通释》四卷，《仓颉篇校证》三卷，《经麈》八卷，《称谓录》十卷（按：实际为三十二卷），《古格言》十二卷，《三国志旁证》三十卷，《文选考证》四十六卷，《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枢垣纪略》十六卷，《春曹题名录》六卷，《南省公余录》八卷，《退庵随笔》二十四卷，《试律丛话》十卷，《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剩话》二卷，《巧对录》四卷，《农家占验》四卷，《东南峤外诗话》三十卷，《长乐诗话》八卷，《南浦诗话》四卷，《雁荡诗话》二卷，《闽中闺秀诗话》二卷，《武彝游记》二卷，《沧浪亭志》四卷，《梁祠辑略》二卷，《梁氏家谱》四卷，《吉安室书录》十六卷，《东南峤外书画》二十卷（按：“画”后应加一“录”字），《退庵题跋》二十卷，《退庵续跋》二卷，《归田琐记》十卷（按：今中华书局排印本为八卷），《浪迹丛谈》十一卷，《浪迹续谈》八卷，《浪迹三谈》六卷，《退庵文存》二十四卷，《藤花吟馆诗钞》十二卷，《退庵诗存》二十四卷，《退庵诗续存》八卷，《师友集》八卷，《寒檠杂咏》一卷，《藤花吟馆试帖》二卷，《东南峤外诗文钞》三十卷，《闽诗钞》五十卷，《闽川文选》五十卷，《三管英灵集》五十八卷，《江田梁氏诗存》九卷，《宣南赠言》二卷，《沧浪题咏》二卷，《东南棠荫图咏》三卷，《葑江别话》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铜鼓联吟集》二卷，《吴中唱和集》八卷，《三山唱和集》十卷，《戏彩亭唱和集》一卷，《闽文复古钞》六卷，《闽文典制钞》四卷，《师友文钞》二十四卷，《八家师友钞》十二卷。

人们只要浏览一下他的著述目录，自会为其渊博学识所慑服。上自天道自然，下至山川地理，高层的礼乐刑政文化，低层的农家耕作谣谚，无不娓娓道来，渊源有据。在清代笔记作家中，堪称大家。其学术思想，当然打上了乾嘉学风的时代烙印。其中有不少与经学考据有关的著作，但思想却不为经学所拘囿，

并不以经学专门名家，而是致力于更为广泛文史探索 and 整理工作，可以称之为“杂家”。所谓“杂家”，绝无丝毫贬义，而是博洽古今，思路开通之谓，也就更加针对现实需要，写什么就像什么。在鸦片战争风云突变之中，敌人的洋枪洋炮，和现实的腐败无能，使他深感革除弊政的必要。因此，在正统人士痛骂明末改革家张居正为“乱臣贼子之不如”时，在戏曲舞台演出《大红袍》加以丑化诋毁之际，梁章钜在这种反改革的大合唱中，投进了一声高亢的不协和音调。他因古思今，称颂张居正的改革具有“振作有为之功”，为“济时之贤相，未可厚非”，所以著述中屡屡称引其《张太岳集》（见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及《浪迹续谈》卷五）。又如《浪迹丛谈》卷五有《英夷》《鸦片》《天主教》诸则，对于清王朝的腐朽，外侮日深，对于英侵略者贩卖鸦片毒害我国人民，又仗其船坚炮利，横行霸道，气焰嚣张；对于传教士以传教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在地方必与其长吏相结，厚馈遗，有事则官长循庇之，以故其教益张”，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论及则“深为扼腕”而慨叹：“其焰复张，甚为可恨，因录旧事以正告夫当事者。”言外之意，弱食中国者，非仅洋人侵略，“当事主持者”腐败无能，自甘为虎作伥，无异引狼入室，当然同样难逃罪责。《浪迹丛谈》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是其致仕家居的晚年之作。作为一个致仕官员，权势已失，说话不能不收敛含蓄一些。同一卷中，又有《水雷》《炮考》诸则，一方面称引许乃济奏摺：“夫以中国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可言。”愤怒抨击外国侵略者，要求奋起抵抗。故身先士卒，率师御敌。另一方面又并不排斥洋人的先进科学技术，主张加以学习，为我所用，以便富国强兵。如《水雷》一则“窃谓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创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涛汹涌，此器如何能恰到敌船之底，又恰能使敌船浑然罔觉，坐待轰击，则皆非胥儒浅识之所敢知矣！”可见并

非一味排外，思想较为开明。对于洋人先进兵器的思索，抨击浅识“膏儒”那些睁眼睛、顽固派，可见其化文观念已经开始更新。只是天不作美，不久作古，只能面对国耻大辱而抱恨九泉了！

三

梁章钜不仅是学者，而且是个诗人，他的诗文，虽然难入少数天才上乘之列，但在嘉庆道光年间，也堪称自成一家。嘉庆年间，他曾学诗法于翁方纲。《退庵诗存》卷首有翁方纲题记云：“手腕境界，迥异时流，……不名一家，而能奄有众家之美者也。忆昔并几论诗，谢蕴山之圆隲，冯鱼山之纵横，皆不若菴林之得路，不过沉著按切而已，无他巧也。而一时才隼，竟皆莫能近，惟兰卿可为菴林畏友耳。兰卿之失，在手腕轻松，然众妙之门，无不可以锐入；菴林之失，在贪写正面，欲求其松而不可得。”对于梁氏诗歌优劣，评说得体。其古诗下笔百千言而滔滔滚滚，取材奥衍，用笔雄健，其选韵虽险，而控制自如，出自杜甫韩苏而能化而用之者。其近体诗质实不佻，明白流畅，韵味醇厚，颇富意境，时得唐人三昧。如其《八月十五夜率成》诗云：

西风客子寒不眠，夜色欲午花含烟。

今月古月共一照，举头低头都可怜。

六十余里故山远，二十一回明镜圆。

此情此景悄谁遣？空庭衣露森吟肩。

直抒胸臆，羌无故实，万里长宦，故乡思恋，情景宛然。其《北东园日记诗》（见《归田琐记》卷八）有一绝云：“半夜挥成《喜雨》诗，平明唱遍瞽儿词。侯门都作沈沈梦，翻笑衰翁局外痴。”自注云：“拙作《喜雨》诗，和者数家而已，余皆噤不出声。”关心民瘼，情溢于辞，抨击沈沈梦中之豪门权贵，意在言外。总